

经济学理性范式的危机与出路^{*}

景玉琴

摘要: 经济学理性分析范式是指以人具有理性、依照理性原则行动而建立的经济学分析框架。理性分析曾是经济学最强大的工具。但理性分析范式近年来一直面临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及来自经济学内部的诘难,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抛弃僵死的、固定的理性概念的图式而转向生动活泼的直观和洞见。经济学有必要理性反思理性范式了,经济学理性范式可能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固守目前的理性硬核,但要明确理性的界域,仅仅把这一分析工具限定在理性可及的范围;另一种出路是寻求一种大一统的理论体系,可以用以解释目前理性范式所能解释得了和不能解释的社会现象,但如此不得不对理性范式做彻底的改造。

关键词: 经济学理性 理性范式 危机与出路

经济学理性分析范式是指以人具有理性、依照理性原则行动而建立的经济学分析框架。理性在这里是一个根本性前提假设,其包括四层涵义:第一,人的自利本性是经济行为的出发点;第二,在所有备选方案中能够筛选出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方案;第三,具有作出最优决策(后修正为满意决策)的信息和能力;第四,知道其他人是理性行动的并据此作出理性行动的能力,在博弈论里被发展为“交互理性”。西方经济学主流分析范式,从古典学派,到新古典学派、新古典综合学派,再到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的非常活跃的当代诸学派,其理论大厦的建立莫不基于理性基础。若缺失这一假设,经济学势必产生混乱。但理性假设却时常遭受质疑,不时出现“经济学理性的危机”。

一、经济学理性分析范式面临的挑战

(一) 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对理性范式的挑战

科学哲学是以反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哲学运动而开始的,科学哲学发端于20世纪初,它形成的标志是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逻辑实证主义在西方科学哲学界曾一度独领风骚,但到20世纪中期,逐渐出现了多个学派纷争的局面,这其中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是很有影响的一个学派。证伪主义影响之大,以至于马克·布劳格说:“证伪主义成为整个20世纪的故事”。证伪主义的精髓在于其认定科

学理论的可错性。波普尔提出,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能够被推翻。不可能被证伪的理论不能称为科学。波普尔认为,科学的命题跟可证伪的陈述是等价的。命题的可证伪度越高,即所禁止的越多,信息量即知识含量也越多。相反,一切不可证伪的命题都是非科学的。我们暂时接受某个理论或定律,不是因为它们得到了事实尤其是实验的证明,而是由于过去的观察跟它们不矛盾。证伪主义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托伦斯·哈奇森开创了经济学证伪主义先河,此后随着波拉尼、汉森、图尔明、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的研究成果的出现,经济学对科学哲学证伪主义风尚的钟爱更加明显,出现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方法论著作,如利普西的《实证经济学导论》(1963年),琼·罗宾逊的《经济哲学》(1963年),斯图尔特的《经济学的推理与方法》(1979年)等。不少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弗里德曼、琼·罗宾逊等人已公开接受波普的方法论。其中,托伦斯·哈奇森对经济学中应用证伪主义方法的推动作用巨大的。1938年,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及基本假定》出版了,这本书把对波普的可证伪性方法论标准带到经济争论中来。哈奇森的基本标准是,追求“科学”地位的经济命题至少应该能使人相信它可以在人际进行经验检验。哈奇森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争论。马克卢普把哈奇森当做极端经验主义者的主要榜样来引用,

* 第39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060390204。

极端经验主义者的意思是,他总是“坚持用从感情观察中得来的客观资料对所有的假设做独立的检验”,从而提出了“一个从事实而不是从假设开始的方案。”哈奇森否认极端经验主义的责难,并且指出他书中很多关于对可检验重要性的论述指的不是假设,而是经济学中“已完成的命题”。但实际上,对于可检验的要求指的是对经济理论的假设还是对它的预测,他是很含糊的。如果让经济理论的假设通过证伪检验,经济学便没有了生存余地!原来理性假设并没有给证伪自己预留下任何空间,换言之,理性是不可证伪的。因为能够解释、论证一切的前提,其本身必然无需解释、论证,也不能被解释、论证,能成为一切的一切之根据的根据本身不可能再有根据。否则,它就违背了逻辑演绎论证的操作准则,将会陷入无穷的循环而无法成为绝对的确定性,也无法获得普遍必然性。然而,这样却把理性自我逼到了它的反面——硬要理性接受逻辑论证,会把以理性为基础的经济学推到非科学的一面。

对经济学假设是否可检验的争论无疑是颇受关注的,弗里德曼 1953 年出版的非常有影响的《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提出了著名的假设不相关命题。弗里德曼认为理论是一个主要是假说的实体,应该用它对它所“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言力来评判,只要事实证据能够表明它是“正确”还是“错误”,而理论赖以建立的假设条件不必现实。这种假设可以任意,只要理论有预测力的论点被萨缪尔森命名为“F 扭曲”。即使不对假设进行检验,只用事实证伪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经济理论太容易被证伪了。比如菲利普斯曲线就通不过检验,其他诸如企业契约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等流传甚广的经济学理论,都不能很好地与现实拟合。按照证伪主义的观点,这时是理论而不是事实应该让步。即使为了保护理论而修整“保护带”,也不免要以牺牲理论解释力为代价。

但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抛弃理论。经济学家逐渐发现,证伪主义对经济学是一剂过强的药,它的结构要求是如此之严,一旦把它严格的应用,经济学就很难称得上科学。霍奇逊指出:“科学哲学的最近发展说明,这些方法论立场经受不住现代的审查。尽管这种方法论的批判本身没有破坏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和模型,但它的确说明,过去关于新古典理论是科学的这一主张,其基础是不可靠的。”经济学家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去重建“科学的”经济学,要么承认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根本的方法论的不同,并放弃证伪主义的考察准则,或者以修正的适合于社会科学特性的弱证伪主义来代替。实际上,经济学家选择了后者。因为经济学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面对着与自然科学很不

相同的现实情况:人活动的目的性和社会不断流动的状态。

(二)非主流学派对主流范式的诘难

居于主流的理性分析范式基本将心理因素排除在外,直觉、灵感、顿悟、本能、意志等心理和社会属性因难以用数学语言精确描述,只好以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的处理方式悬置起来,这种高度简约化和工具化的分析范式一直遭到非主流学派的诘难。其论点主要有:

第一,非理性与理性一样是支配人类行为的重要因素,如果不是更重要,至少也是同等重要;而且,非理性还是理性的强干扰因素。主流经济学理性分析范式一般假定偏好不变,认为决策者对自然状态和自己行为的效果会形成预期,并根据统计原则处理现有信息。在既有的市场条件下,决策者面临一组选择方案的特定组合,其行为就被假定为:正确地分配相关随机事件的概率,选择一个使预期效用最大化的行动。很多经济学家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提出选择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多种因素都会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知觉、信仰或心智模式。诸如感情、态度等内在动机也会影响一项决策。此外,对以前决策及其后果的记忆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认知函数。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认为,决策者不总是依据概率法则评价不确定前景,有时,制定决策会违背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人们通常无法充分分析包含经济和或然判断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下,人的判断依赖于特定的捷径和直观,有时会产生系统性的偏见。阿克洛夫认为偏离完全理性的主要原因是人类的中庸思想,如代表性、普遍性等。他也提到其他两个原因:一是人类行为趋于社会准则,二是“拇指规则”。两种原因均能产生平均的结果,但都不会与完全理性及最大化一致。他认为,一个符合现实世界的理论必须基于人类非完全理性的假设,否则,“它将是非科学的简化而从事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哈耶克认为人类行动充斥着下意识、本能和机械的神经冲动,理性不是绝对之物。“那种认为理性能够成为其自身的主宰并能控制其自身的发展的信念,却有可能摧毁理性……我们必须维护那个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领域。”理性范式是逻辑中心主义的,哈耶克指出语言逻辑存在天然的限制性。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柏格森、萨特等也都反对逻辑中心论,在他们看来,具体事物一旦被概念化而成为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的普遍共相,就不成其为事物,而现实的个人一旦没有了血肉之躯,缺失了本能情感也就没有人的意义和价值可言。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抛弃僵死的、固定的理性概念的图式而转向生动活泼的直观和洞见,进而由静止的僵硬的概念、逻辑进入流变的绵延不绝的

生命之流。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进一步主张用语言的对话、交往行动来替代逻辑概念的反思和独白。

第二,即使是承认理性的支配地位,也因为理性有限性的制约,永远达不到完备理性的程度。理性要求人做事有目的性和前瞻性,具有关于未来的详细的概率图景。实际上理性人往往并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当人们没有关于未来的一个完整的概率图景时,会出现真正的不确定性:关于什么事情将要发生实际上是不确定的;关于未来的福利是如何被每一种可能的结果影响的也不确定。即便消除了不确定性,受制于理性能力,人们也不能完全依理性行事。例如市场完全竞争,价格真的能够反映出各种信息的时候,人们处理这些信息会力不从心——就像计算机的内存和速度不够。现代经济的虚拟化和信息化程度的加深,一方面完善了市场,另一方面增加了人们所需要处理的信息量,在人们的信息处理能力滞后的条件下,非理性行为的作用越来越强,经济似乎越来越不能趋向于均衡。

第三,基于自利基础的理性分析范式不能很好解释诸多利他行为。理性范式可以解释互惠利他与亲缘利他行为,对非互惠利他与非亲缘利他行为却毫无解释力,这类行为的广泛存在无疑构成对理性范式的挑战。像雷锋式行为就不可以用基于自利基础的理性范式来分析,有人试图以效用偏好来将雷锋行为纳入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其结果甚为牵强,很难令人信服。如果把一切行为统统归结为自利,企图建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理论,经济学的末日也就不远了。其实,亚当·斯密建立理性分析范式之初,自利理性仅仅是一个人性抽象,“据我所知,从自爱推断出一切情感和感情,即耸人听闻的有关人性的全部阐述,从来没有得到充分和明白的解释,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源于对同情体系的某种混乱的误解。”在《道德情操论》开篇他就写到:“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显然,同情心不是来自对自己利益的关注,而是出于人的“本性”。“同情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看成一种自私的本性。”作为经济学理论基石的理性假设,从其提出到如今若干年的发展,经历了从人性抽象到工具意义的演变。斯密眼中的理性经济人是合乎道德的,是受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约束的,法律、习俗惯例、社会地位及别人的评价等构成对极端自利行为的强有力制约。随着数学的大量应用,经济学理性由最初的人性假定逐渐演变为工具性概念:理性被膨胀为追求最大效用

的工具,经济人被转化为一种理性选择概念,市场被视为一种计算手段和机械结构。随着经济学日益形式化和工具化,理性愈益与不能带来好处的对别人的同情帮助不相融。

(三) 博弈论强理性假设广受质疑

理性假设遭到多方攻击时,弗里德曼曾提出“好像理性”作为替代。他认为,虽然人们并不总是理性的,但那些在长期中生存下来的企业、那些在竞争中获胜的群体,其行为必定有意无意地遵循了理性原则。阿尔钦说,如果我们在芝加哥观察从洛杉矶出发向着芝加哥行进的一群赛车,我们不知道他们中途会走哪条路,不知道哪条路上有加油站,不知道哪些赛车能够到达终点。但我们知道,最后能够到达终点的赛车必定是路过了加油站的(尽管可能全凭运气),这就足够了。不妨假设“所有在芝加哥被观察到的赛车都理性的选择了有加油站的路。”因此,理性假设可以不实际,但有用。在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内,好像理性还可以发挥作用,但当博弈论进入主流经济学并成为其主导分析工具后,好像理性已经不够用了。博弈论将参与者看作是内省的、有超强计算能力的人,并提出两个很强的假设:一是个人的最大化行为(每个经济人是理性的决策者),二是一致预期(每个人对别人行为的预期都是正确的)。这是纳什均衡的必要条件。在博弈论中,对理性的要求是实质性的,博弈参与者必须具备理性知识与理性能力,能够进行理性决策,“人是理性的”在博弈理论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博弈论中,不仅假定所有博弈参与人是理性的,而且假定“所有人是理性的是博弈参与人的共同知识”。显然,这是强理性假设。按博弈论原理进行推理论证,是不允许“好像理性”存在的。以著名的“囚徒困境”为例,虽然最后的纳什均衡对双方都不利,却是个人理性最大化的结果。这不能用“好像理性”的工具立场来解释。博弈论强理性假设招致许多批评。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对个人互动行为的研究,经典博弈理论对均衡的讨论存在着大量可质疑的地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结果远不是最终的结论。实验经济学早期的研究致力于一些博弈模型理论预期的检验,尤其对“囚徒困境”的两难博弈问题进行了研究,后来逐渐涉及讨价还价、协调博弈等各类博弈实验研究。结果发现,许多经典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分析与现实结果相矛盾,并通过大量的实验结果的统计分析建立了许多新的更符合观察到的参与人行为的理论模型,典型的有博弈学习理论的实验研究。

二、经济学理性范式的出路

经济学曾经骄傲地宣称,理性分析是自己最强大的工具,凭借这个工具,不仅经济学内部可以实现

统一,还有望“统一”其他社会学科。在面临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及来自经济学内部的诘难时,经济学有必要理性反思理性范式了。遗憾的是,国内理论界对这个问题还缺乏必要的关注。多数学者还把经济学理性范式当作标准的规范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称之为“现代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方法,我们应好好学习并广泛运用;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样高度抽象化甚至数学化的研究方法不适合于我们,经济学的数学化弊端重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应走自己的路。

经济学理性范式是从“理性为自然立法”的信仰里生长出来的。理性要把人当作数据来处理,以抽象刻画具体。但社会的发展使人的“个性”凸显,抹杀个性的抽象理性其解释力在衰减。过分抽象的、标准化的分析范式面对日益个性化的社会显得苍白和乏力。尽管理性范式的“保护带”被不断修整,人们却更多地把矛头指向其“硬核”。是不是经济学理性范式真的陷于穷途末路了呢?

经济学家不这样认为。许多经济学家试图修正并“拯救”理性范式。贝克尔较早地把经济理性与非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并用市场的理性去整合经济单位的非理性行为;穆斯、卢卡斯和萨金特等人以理性预期作为建模的基石,并由此复活了新古典经济学;弗里德曼提出理论假设前提可以不必真实,只要据此得出的结论具有预测力;阿尔钦的“进化命题”则认为,长期来看人们的选择总是理性的。目前,西方一些经济学家正致力于在不同方向上修正理性范式:诺斯试图将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方面的新成果引入经济分析;威廉姆森企图在收集和分析商业案例中寻求突破;阿克洛夫在用功于“PSA - Economics”(P,心理学;S,社会学;A,人类学)的创建;埃兹雷尼准备将康德的道德哲学运用于经济学,重建经济学的双重人格(自利性与社会性)。

本文认为,经济学理性范式可能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固守目前的理性硬核,但要明确理性的界域,结束它的“帝国主义态度”,结束对理性范式的过分崇拜,仅仅把这一分析工具限定在理性可及的范围。就像人们为牛顿的理论划界一样,界域之内,是理论起作用的地方;界域之外,理论失效(但并不因此否认其科学性)。汪丁丁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中说:“经济学理性选择模型只能容纳‘反应性选择’——仅仅满足于对外界刺激作功利计算而不包含判断和理解……经济学被认为具有一种‘帝国主义’态度,它的最大边界在哪里?我认为可以这样界定经济学帝国的可能范围:即理性选择与实证方法,缺一不可。只要在这两项原则都适用的地方,就可能经济分析。”汪丁丁为理性范式规定的界域就

是“理性选择加实证方法”;另一种出路是寻求一种大一统的理论体系,可以用以解释目前理性范式所能解释得了和不能解释的社会现象。这当然是经济学家喜欢的结局,但如此一来就不得不对理性范式做彻底的改造。经济学不可能用已有的方法去统一其他社会学科,相反,必须虚心向其他社会科学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交叉与融合,从中发现理性范式改革的出路。

历史地看,经济学理性范式把人当作数据来处理体现了当时的进步。经济学理性范式产生于数学与物理学的英雄时代。“当时科学进步主要依靠的是伽利略所倡导、笛卡尔给予充分发挥的逻辑抽象及演绎的理性方法。这一方法试图在五光十色变化多端的外部世界背后,去寻求无形的驱动力和内在因果性、必然性及其规律。通过设定一个逻辑原点或假设一个前提并通过它演绎出对象世界的完整构架。”斯密第一个把实证科学的逻辑理性方法完整地运用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他效仿牛顿自然哲学的实证方法,建立了“原子”社会经济观。如同自然哲学家把物质的运动从逻辑上还原于原子或分子运动一样,斯密试图把一切经济现象还原为抽象个人的行为。而这最终发展为经济学理性范式。经济学引入理性分析方法对经济学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它体现了科学主义对宗教迷信的胜利。而现在到了再一次对经济学范式进行革命的时候了,把数据还原成人,反映人的真实。经济学正在经历的这种“否定之否定”的发展体现了新的飞跃,体现了人类对真理的终极追求——人类总在试图揭示真正的规律——自然的和社会的。马歇尔曾说过,经济学是广义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的确,仅仅进行数据抽象是不够的,这只是经济学发展的初级阶段,下一个阶段要把舍象掉的关键因素加进来,直面现象而不是依据理论来进行经济研究。

注释: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中文版,10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中文版,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中文版,80~8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文版,420、5、4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张雄:《理性的崇拜及其遗憾: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审视》,载《哲学研究》,1996(2)。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广州 510006)
(责任编辑:N、S)